

茶

茶道与文学

吴远之 耿晓辉 著

海外
借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茶道与文学

吴远之 耿晓辉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道与文学 / 吴远之, 耿晓辉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207-0502-8

I. ①茶… II. ①吴… ②耿… III. ①茶文化—研究—中国

②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 TS971.21 ②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2528 号

茶道与文学

(CHADAO YU WENXUE)

作 者: 吴远之 耿晓辉

责任编辑: 肖 刚 杨 灿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政编码: 100007

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4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207-0502-8

定 价: 39.0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目 录



绪 论

在道、茶、文之间 /1

- 一 静品幽思，茶道与文学的对话 /5
- 二 茶神布道，神话传说中的茶 /13
- 三 茶诗传道，茶道的诗意空间 /18
- 四 茶文载道，由“务虚”到“悟空” /24

第 一 章

从茶祖神农神话说起 /33

- 一 氏族血统和帝号传承 /38
- 二 牛首人身的太阳神 /42
- 三 “生命树”“丹木”“木禾” /45
- 四 原始崇拜的“变与不变” /50
- 五 茶祖神话的现代接受 /54

第二章

竹下忘言对紫茶：唐宋茶诗之道 /59

- 一 茶之愁绪的兴象与论说 /63
- 二 多维茶语中的隐逸品格 /71
- 三 唐宋茶诗的人间情怀 /75
- 四 茶、道、诗的“三位一体”性 /83
- 五 “茶禅一味”的诗歌表达 /88

第三章

茶道的“美文”属性及其思想内涵 /93

- 一 茶赋在铺张扬厉后的深情 /98
- 二 “道”的建构与“茶”的解构 /107
- 三 茶文新变，茶道与文道的互通有无 /117
- 四 寄寓遥深的私人化写作与茶道审美 /123
- 五 有清一代茶文传道的疲敝 /130

第四章

作为小说叙事关键词的“茶” /137

- 一 自玄幻转向现实的存在悖论 /142
- 二 茶俗、茶礼、茶道的递进式发展 /148
- 三 当茶与小说情节和人物形象密不可分 /154
- 四 人物心理的刻画与“生而为人”的思索 /161
- 五 茶小说的文本虚构及作者的真实 /167



茶道、茶文学的现代变迁 /175

- ① 现代性的困境和困惑 /181
- 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90
- ③ 于新、旧学术交汇中重新发现自我 /196
- ④ 城市、社会与人的现代性契机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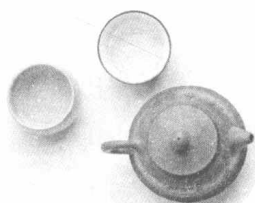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217

后记 /229

在道、茶、文之间

／ 绪论





茶，这枚诞生于宇宙洪荒时代的树叶，与远古人类共同走过冰河世纪之后，在历尽劫灰之余，终于被我们的祖先认识，进而成为知己。从药用解毒到佐食烹调，再到单一饮品，我们对于一枚树叶的认识逐渐走向深入。我们不再仅仅关注于茶的清香、甘甜或是苦涩，而是从茶中品出了些许人生况味和那些说不尽、道不明的精微思绪。一旦与人类的心灵相通，茶最终在百千饮品中脱颖而出。“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1]，茶不再是一枚普普通通的树叶，也不只是一种让人心旷神怡的滋味，而是逐渐跳出物质世界的藩篱，开始与人类的精神世界对接，并与“道”终成一体，形成蔚为壮观的“茶道”一门。

道的本意是路径，在人类抽象思维的引申下，道逐渐被赋以“神”与“真理”的深刻内涵。《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2]，意在言明，思想和言说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永恒的悖谬关系^[3]，真理一旦诉诸言语成为能够被说出来的真理，也就不再是真理了；《圣经》也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4]，意在言明，“道就是神，道就是主宰一切的造物主”。刘勰《原道》亦谓“夫玄黄色杂，方

[1] 语出西晋诗人张载《登成都白菟楼》诗，收入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0页。

[2] 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页。

[3] 参见张隆溪著，冯川译：《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4] 中国基督教两会：《圣经》（中英文和合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610页。

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这似乎也在言明，“道与文，文与道，也存在着某种说不出、理还乱的关系”，于是“文道”生焉。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茶和文之间，这个本来相去甚远的语义鸿沟，竟然被“道”轻而易举地填平；而道作为二者沟通的桥梁，不仅时常将茶和文（包括文字、文章、文辞等，可统称为文学）联结起来，而且，也让它们在对话中互相渗透，甚至互相影响，以至互为表里，俱得风流，并最终在“道”的层面达到统一。

因此，茶与文、茶道与文学，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一个问题，其所涉及的范围甚为广泛。从文体上说，有关茶的神话、传说及诗文、戏曲等（不管是口头上的，还是落实在文本中的）文学形式的广泛存在，是茶道与文学得以联系起来的文献基础和文化源头；从历史渊源上讲，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茶和文早在炎帝神农时期就凭借着几则神话发生了紧密联系，此后的数千年它们就犹如一对亲兄弟，在众多诗文词赋中频频出现，它们不分彼此、不论贵贱，共同谱写出了华夏民族的辉煌史诗；从影响范围来看，茶不仅深入文人内心，与文人的文学创作活动密切相关，而且茶也进入了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并成为文学创作的取材对象，成为文学描写的重要方面。茶的身影丰富了文学表现的冲击力，也深刻影响了华夏民族的审美和价值倾向。“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2]诗文中自从有了茶，就有了一种雅致的生活追求，有了

[1]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

[2] 语出唐代诗僧皎然《九日与陆处士饮茶》一诗，收入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211页。



一种为人处世的做人行事风格，最重要的是多了几分参透宇宙人生的功力。

总之，在茶与文、茶道与文学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的集中体现就是涉茶诗文、神话、小说等各类文学作品的大量存在。可以说，任何一篇关于茶的文学作品都是“茶、文、道”三位一体关系的具体显现。同时，持续繁复呈现的文学作品，在关于“茶”的互文关系中不断推陈出新，就如同一次次清雅且密集至极的文本尝试，更像是一次次意义深刻的思想碰撞，不经意间已将茶道与文学同步推向深入。因此，要想彻底弄清其中纷繁复杂的奥秘所在，就需要从不同的文体及文本入手，通过对涉茶文学作品的细致解读，去发现其中难以言说的隐微曲折。

一、静品幽思，茶道与文学的对话

“茶道”一词语出唐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其中有言：“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1]短短数语之中，“道”字凡两见，“茶道”凡一见，说明皎然十分重视饮茶过程中的“得道”体验，并首次明确将物质属性的“茶”及与“茶”有关的品饮活动上升为精神属性的“道”和“修道”之重要途径。此种观点，与其好友茶圣陆羽的见解颇有不谋而合之处，陆羽指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2]其中，“精行俭德”四字十分精练地阐述

[1] 语出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收入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260页。

[2] 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了茶的精神气质，同时，这也可看成是对皎然“茶道”一语内涵的简略说明。此后，无论是宋徽宗赵佶在《大观茶论》中对茶道精神“祛襟涤滞，致清导和”^[1]的概括，还是明代张源于《茶录》一书中对“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2]之茶道核心内容的提倡，都基本上延续了皎然着重强调“茶”之精神属性的思路。

古人对“茶”和“茶道”的深刻认识，也深深影响到了今人对“茶道”的理解。在全面总结了历代茶道、茶文化相关论述及日、韩茶道的特点，充分吸收了日、韩茶道的精髓之后^[3]，现代茶人特别点明茶道不仅是一门品饮的艺术，更重要的是其与儒、释、道思想

[1] 赵佶等著，沈冬梅、李涓编著：《大观茶论》（外二种），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页。

[2] 张源撰：《茶录》，收入朱自振、沈冬梅编著：《中国古代茶书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

[3] 关于日、韩茶道，学者们普遍认为“茶道”虽然源于华夏，但却在日、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甚至充分介入了日、韩国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思想领域。尤其是在日本，一些学者较早便开始试图从现代学术角度为“茶道”重新定义一个能够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科学概念和范畴。较有影响的如谷川徹三，他以艺术的隔离性为根据，将茶道定义为，以身体的动作为媒介而演出的艺术。久松真一则从宗教角度对茶道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茶道文化的内核是禅。茶道忠实实现了禅的“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的修行思想，并把禅宗从寺院伽蓝中解放出来，使禅与庶民生活相结合，创造了新的禅文化。熊仓功夫另辟蹊径，以史学家的眼光对茶道内涵进行了考察，主张茶道是一种室内艺能。仓泽行洋再从哲学角度出发，提出了茶道与人心双向交通的命题，认为茶道以深远的哲学思想为背景，综合生活文化，是东方文化之精华，道是通向彻悟人生之路，茶道是至心之路，又是心至茶之路。（参见林瑞萱：《日本茶道源流——南方录讲义》，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1年版，第40—45页；千宗室著，萧艳萍译，修刚校：《〈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3页；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靳飞：《茶禅一味：日本茶道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218页；千玄室监修：《日本茶道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97页；孙机：《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6月刊；张建立：《日本茶道浅析》，《日本学刊》2004年第5期；施由明：《自由的性灵舒放与刻意的精神修炼——试析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根本不同》，《农业考古》2009年4月。



及人生修养、生命领悟等主题具有深层次的联系^[1]，诚如周作人所言：“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现实中享受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2]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位散文作家，周作人对“茶道”的理解集中体现在他精心构撰的一篇散文《喝茶》当中，以此反观皎然“茶道”理念的提出也是借由其创作的诗歌来传达的，二者之间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继承线索，但是这种跨越了千年的茶道与文学的相遇绝不仅仅是一个巧合。事实上，自古及今的大量文学作品里，都频繁出现了茶的艺术形象和茶道的相关理念，可以说文学作品是除了专门的茶书（诸如《茶经》《大观茶论》《续茶经》等）之外，最为重要的茶道及茶文化载体。朱海燕甚至认为，正是因为茶文化 with 诗词文化的完美契合，才迎来了唐宋时期茶文化、茶诗词的盛世光景，而一首首千古流传的茶诗词，毋宁说更是组成了一部诗化的茶文化

[1] 吴觉农认为茶道就是把茶视为一种高尚的饮料，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是一种艺术，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庄晚芳更进而概括出茶道中包含了“廉、美、和、敬”的理念，林治则认为“和、敬、怡、真”应作为中国茶道的四谛。虽然这些观点并没有最终统一，但现代学者已基本上认可茶道的内容不仅包括茶艺、茶礼、茶境等内容，更重要的是还包含修道的要求，其对净化人们的思想意识，提高道德水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相关论述可参考吴觉农主编：《茶经述评》，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5 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林治：《中国茶道》，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0 年版；姚国坤：《茶文化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4 年版；吴远之主编：《大学茶道教程》（第二版），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年版；王玲：《儒家思想与中国茶道精神》，《北京社会科学》1992 年第 2 期；尹志邦、杨俊：《茶道“四谛”略议》，《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3 期；李萍：《中国传统文化与茶道四境说》，《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

[2] 语出周作人文《喝茶》，收入周作人著《雨天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8 页。

史^[1]。因此，我们可以说茶道与文学自古以来就具有着相同的文化基因，中国茶道的精神追求，在很多时候与中国文学的精神追求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为启发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吾道自足”的理性光芒，主要包括自得自乐的人文旨趣、自娱自适的创作心态、自彰自明的言志传统、自珍自恋的物化情结（比如中国文人对梅兰竹菊等内在品质的揭示与其对茶之精义的比拟并无本质上的不同）等^[2]，也都能在茶道精神实质和内涵的诸家阐述中得到印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茶道和文学活动的行为主体上看，文人士大夫始终都是广泛而深入参与其中的核心成员，这是茶道与文学能够关联在一起的根基所在。被尊为茶圣或茶神的陆羽，因其经典著作《茶经》的传世，而以茶学开山祖师的身份名传千古。然而，在茶圣、茶神光芒的掩盖下，人们往往忽略了陆羽同时也是唐代的著名诗人兼文学家的身份。据粗略统计，《全唐诗》中共收录有陆羽的诗作2首、残句3条，以及与他人唱和共同完成的联句诗15首^[3]，这些流传至今的诗作虽说只是陆羽一生文学创作的九牛一毛，但已能初步见出其作诗的超绝功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陆羽一生交游甚广，凡所结交几乎囊括了其同时代的最优秀的诗人和文学家，他们一起品茗论文，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既谈茶道又通文学的文化圈子^[4]。而且，陆羽的文学才华和诗歌创作早在唐代便获得了同时代人的的一致好评，其中不乏颜真卿、刘长卿、权德舆、戴叔伦、孟

[1] 朱海燕：《中国茶美学研究——唐宋茶美学思想与当代茶美学建设》，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农业大学，2008年，第15—17页。

[2] 参见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42页。

[3] 参见史念祖：《〈全唐诗〉中的陆羽史料考述》，《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

[4] 参见文野、英峰：《中唐湖州茶文化圈——兼谈陆羽等与茶道文化的诞生》，《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丁国强：《游走在“乐群”与“乐道”之间——从“交游酬唱”诗看中唐湖州文人茶友的文化心态》，《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郊、皎然等卓然大家，他们无一例外都对陆羽品茶鉴文之才能钦服有加。因此，即使没有《茶经》的写作，陆羽也能凭借其文学才华和上乘诗作被划入他那个时代的大文学家行列而毫不逊色^[1]。只可惜，目前流传下来能为后人看到的有关陆羽的文学材料已是少之又少，我们很难根据历史文献上的只言片语就复原出陆羽的全部文学成果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但陆羽身为文人士大夫中的一员，并在《茶经》的写作中颖悟茶道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同样，与陆羽交好的众多文人，他们在与其唱和于茶中之道有所心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其中，又尤以沙门中人皎然对茶道的贡献最著，而可以肯定的是，皎然虽皈依佛陀、栖心世外，但他文人士大夫的家庭出身仍然是其身上最为显明的文化标签之一^[2]。除此之外，唐宋以降，还有着更为庞大的士大夫人群都统统参与到了茶道和文学的相关活动当中，他们在吟诗作赋的同时，也一样倾心于煮茶技艺，热衷于品茗论茶，并以此作为其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和方法，他们借茶抒怀、因茶求道的行为，本质上与他们借助文学作品来抒发情感、追求真理的行为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二者在多数时候都是亲密无间的关系，甚至还能经常性地融为一体。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以及白居易、元稹、颜真卿、卢仝、柳宗元、苏轼、陆游等文学大家不仅是许多脍炙人口的茶诗词、茶文的作者，而且还是当时茶道的提倡者及实践者，他们都对茶道的形成、发展和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是从茶道和文学的审美特征上看，中国茶道和文学都有一种崇尚自然的情结，特别重视情趣、意境和神韵的缔造，而对于外在

[1] 参见李广德：《陆羽是大文学家与陆羽热和陆羽学问题》，《农业考古》2015年第2期。

[2] 皎然，俗姓谢，出家后名皎然，字清昼。据漆绪邦考证，皎然出身南朝高门谢氏家族已是确定无疑，但其十世祖究竟是谢灵运还是谢灵运的从兄弟谢密，仍有待考证。参见漆绪邦：《皎然生平及交游考》，《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程序、言辞等形式之美却从不过分奢求。陆羽所提倡的茶之“精行俭德”“野者上”的美学，与中国文学中倡导的“辞达之旨”“不言之妙”与“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理念具有天然的相通性。所谓“精行俭德”，一般理解就是“修身养性、清静淡泊、生活简朴”^[1]的意思，并包含有“行为精诚专一，没有旁骛，品德简约谦逊而不奢侈”^[2]等引申含义。可见，“精”“俭”乃是陆羽对茶事活动的基本要求，他所强调的就是饮茶一定要远离生活中的繁文缛节和琐碎嘈杂，进而才能一心去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而茶事活动的节俭和朴素，正是净化人心的主要力量，此举亦能和“野者上”（就是以天然生长的野生茶树之叶为佳品）的鉴茶原则以及《茶经·九之略》中所营造的那种“亲和自然，野趣横生，意境幽远”的“野人茶”或“隐逸茶”的格调相匹配^[3]，茶叶的浑然天成与茶事的俭朴自然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中国茶道的意境和神韵之美。“茶文化是最具自然性质的一种文化形态。”“事实上，‘自然’‘隐逸’观念与茶，本身就存在着有机联贯性。”“茶与隐逸的内在关系，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的层面看，都是自然形成的。特别在唐代茶文化兴起之后……而只要在精神上有超然之心的士大夫都纳入进来，他们就会成为社会生活中一支不小的力量，就必然推动茶与茶事的发展。”^[4]同理，精神上具有超然之心的文人士大夫不但将“茶”引入文学，更重要的是通过“茶”的文学形象，实践了他们在“自然诗学”“境界说”等方面的野心。自从孔子发出“辞达而

[1] 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2] 林瑞萱：《陆羽茶经的茶道美学》，《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

[3] 参见刘学忠：《从〈茶经〉“九之略”探陆羽的茶道取向》，《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4] 赖功欧：《中国哲学中的自然与隐逸观念及其茶文化内核》，《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相关论述还可参见关剑平：《陆羽的身份认同——隐逸》，《中国农史》2014年第3期。



己”的议论，就已经包孕了意义大于形式的内涵，魏晋诗论家更是从“缘情体物”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大幅改造，使得“中国诗人素来不去片面追求诗歌语言自身之形式的精美，而是执着于‘情貌无疑’的描述效果”，由此便为中国文学崇尚自然传神的“神似”而不是忸怩造作的“形似”的特征打下了坚实基础^[1]。而中国古代的“自然诗学”“境界说”等文学理论正是以“神似”为出发点，去论述文学超越生活、超然物外的性质的，并最终在茶诗、茶文的写作中将茶道之“野”与文学之“神”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正如白居易《琴茶》诗所咏的那样，“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自抛官后春多梦，不读书来老更闲。琴里知闻唯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常相伴，难道吾今无往还”^[2]，茶最适合表达抛官闲处的士大夫情怀了，那种“陶陶任性”的自然旨趣和超脱境界就是茶道和文学的最佳结合点。

三是从茶道和文学的终极追求及理想实现上来看，人的生命意识、人间情怀及其神圣发现，道的崇高属性及其人格化等人类最高思想的理论精华都始终隐身其后，成为决定二者深度和影响力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更深层的形而上领域，茶道由人之静品最终归结为人道，而文学也由人之幽思联想最后上升为人学，从这个意义上讲，茶道和文学都是人类崇高意识的产物，更是人类反思自身处境、思考宇宙人生、超越生死以期无限接近那永恒不灭、亘古长存的绝对理性的契机所在。皎然说“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卢仝也说“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

[1] 参见韩经太：《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104页。

[2] 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56页。